

后现代转向

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THE POSTMODERN
TURN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史蒂文·塞德曼 编

吴世雄 陈维振 译

王 峰 陈明达

陈维振 审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后现代转向

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史蒂文·塞德曼 编

吴世雄 陈维振 译

王 峰 陈明达

陈维振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沈阳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转向／(美)塞德曼(Seidman, S.)编；吴世雄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8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The Postmodern Turn

ISBN 7-5382-6101-X

I. 后… II. ①塞…②吴… III. 后现代主义—文集 IV. 1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4314号

The Postmodern Turn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作者	史蒂文·塞德曼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译者	吴世雄 陈维振 王 峰 陈明达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审校	陈维振
版次	2001年8月第1版	特约编辑	谢翰如
印次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1/32	责任校对	马 慧
印张	13.75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字数	339千字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7.50元		

致 谢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菲律宾许自钦先生的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译者

内容简介

《后现代转向》一书将后现代人文研究的一些最重要的论述集于一册。本书强调了知识的社会性和修辞性，倡导一种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学科界线的社会知识观。本书是第一部此类文集，它向读者提供了利奥塔、哈拉威、福柯和罗蒂等作者的经典著述。这些作者中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妇女和同性恋研究、哲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著名理论家。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领域中的教师和学生而言，《后现代转向》将是一部不可不读的教科书。

目 录

引言	1
史蒂文·塞德曼	
第一编 后现代主义作为社会理论的实例	
第一章 后现代状况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35
第二章 谱系学和社会评论	
米歇尔·福柯	51
第三章 方法，社会科学和社会希望	
理查德·罗蒂	61
第四章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	
科尔内尔·韦斯特	87
第五章 生控体的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唐娜·哈拉威	110
第二编 论争的基础：再现的危机	
第六章 社会学理论的终结	
史蒂文·塞德曼	159
第七章 《被称为我的脊梁的这座桥》的理论主体和盎格鲁-美国女权主义	
诺尔玛·阿拉尔孔	188
第八章 不确定的基础：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的问题	
朱迪思·巴特勒	207
第九章 社会分析的主观性	
雷纳托·罗萨尔多	231
第三编 作为修辞、叙事和批判的人文研究	
第十章 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	
齐格蒙特·鲍曼	251
第十一章 论人种学的象征	
詹姆斯·克利福德	277
第十二章 修辞性、文本性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 转向	
理查德·哈维·布朗	311
第十三章 没有哲学的社会批评：女权主义与后现 代主义的一次对话	
南希·弗雷泽和琳达·尼科尔森	328
第四编 后现代的社会分析：经验主义的阐释	
第十四章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学	
查尔斯·C. 勒梅特	355
第十五章 解构平等与差异的对立：或面向女权主 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运用	
琼·W. 斯科特	379
第十六章 话语的困扰：政治学、文艺理论与艾滋病	
李·埃德尔曼	402
人名译名对照表	422

引言^{*}

史蒂文·塞德曼

现代西方的核心是启蒙文化。关于人类本质的一致性，个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力量，西方之优越性，科学即真理的观念的假定以及对社会进步的信仰，对欧洲和美国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可是，这种文化现已陷于危机的状态之中。到处都有文化动乱的迹象：基督教基要主义正在复兴，重要的社会机构正在丧失威信，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党派变得衰弱无力，对知识的范式及其在书面上和美学上的标准问题也发生了文化论战。西方社会正发生着一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后现代”的概念起码反映出这场社会变革的某些方面。

现代性并不会戛然而终。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现代化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目标。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吸收现代化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在那些典型的农业经济的、具有多元地方文化传统的以及家长制的社会中，赞成现代化的精英们经常倾向于寻求西方社会日益集中的社会动力、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道德和知识。在西方，现代性依旧根深蒂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并未消失：诸如，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工会、政党和利益团体为中心的政治，围绕着市场和确保经济增长并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国家调控之间的相对优势所展开的各种意识形态争

* 克里斯·英格拉哈姆和琳达·尼科尔森对本文曾提出宝贵的意见，谨此深表谢忱。

论,社会公共机构的分化和职能专一化以及机构内部的职业化,将知识分成不同的学科并以科学启蒙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加以建构,一种在其中有望获得自我拯救和解放的文化的公众仪式。现代性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可能正处于危机之中,但它仍继续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模式。

如果现代性还没有终结,而我们提出“后现代转向”又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部分地说,如果我们所讲的是那些非西方的国家(例如,非洲、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的话,那么这个提法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在论及许多东欧国家时,这个提法也同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迄今为止,有关后现代性的讨论几乎全都发生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和美国,而在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则没有那么普遍。的确,朝着后现代性的文明转向的思想主要是由西方人(大部分是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提出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与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乱有关。换言之,应该把“后现代的转向”的提出作为西方最近历史的一部分载入史册。

西方世界正向后现代转变的断言并不需要预设现代性的完结。“现代”(modern)和“后现代”(postmodern)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为了突出社会趋势可以用分析法加以区别的那些普遍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或情感。在艺术界和建筑界,我们看到后现代显露出对风格的影响: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已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等级区分;各种不同的美学规范之间的折衷主义的融汇;人们对那些往昔的、地方的传统的怀恋;现代美学的那种一本正经的道德观已经被一种戏谑的、嘲讽的姿态所取代。一些社会分析家把这些美学上的转变看作是西方社会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在“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即破除社会机构和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国家

经济、文化的“反割据”(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中,后现代的标志随处可见。

在知识领域,后现代的主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例如,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诸如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新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以及高雅文化评论和大众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呆。由于科学诸学科间的界限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由于拥有普遍知识的说法缺少可信度,也由于知识已被视为权力和修辞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此,知识的涵义本身正在发生着变化。

《后现代转向》一书所提出的论述向社会知识的启蒙范式提出挑战。它旨在审视关于对人文研究进行反思的各种建议。这个“后现代”的知识向学科的分界,科学、文学与意识形态研究的隔离,以及知识和权力的分离提出挑战。

后现代主义作为社会理论的实例

人类科学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构建是不可缺少的。霍布斯、孟德斯鸠、孔多塞、休谟以及亚当·斯密不只是对现代化进行了思考,他们的论述本身也成为现代性的构成成分。例如,关于社会的新科学理论明确表达了新的社会秩序的各种理想,为社会机构及文化的建设规划了蓝图,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的合法性及其为处理大批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欲重新安排社会领域及技术技能的合法性提供论证,为通过确定同一性和社会准则来实现社会控制欲望的战略的合法性提供说明。

人类科学必须面对由现代国家、世俗教育机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官僚体制的构建所产生的各种冲突。与此同时，它还必须为自己在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合法性而奋斗。新科学的辩护士们反对那些拥护基督教的教会精英和拥护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世界观的人文主义精英分子。他们反对根深蒂固的俗文化和精英文化把社会领域看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等级清楚的自然或神圣的秩序的一部分。

社会科学的缔造者们斗争的核心是那种认为科学与宗教、玄学和民间传说不同，惟有科学才能产生真理的主张。宗教、玄学和民间传说则被定义为纯粹的个人见解、意识形态、神话或个人信念。让科学享有真理的特权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尤其是它取消了将其权威建立在宗教文化之上的教会的合法性。这场就科学的合法性展开的论战是17和18世纪社会冲突的政治焦点。

对于人文科学的合法化而言，有两个辩护策略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提出一个关于知识的性质的理论，将知识与宗教、个人见解、意识形态或神话区分开来。哲学则作为专门制定这条分界线的学科站了出来。尽管哲学家们就知识的结构和条件问题争论不休，但他们都一致认为，这样的一种理论应该包含承认人的心智与客观世界是不同的，以及语言作为人类心智与客观世界的中间介质可以反映或再现客观世界的思想。使社会科学合法化的第二个策略包括粗略地描述人类进化的宏伟故事，从中说明人类科学的崛起既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

社会科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经历了形式上和社会角色上的许多变化。大学成为繁殖这种知识的主要场所；人类科学以学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的方

式得以组建起来；人类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界线得到固定；人类科学经历了一个数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在社会知识的学科化过程中，社会科学仍然依托在“基础性”求证上。这种求证采取的是知识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的方式。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人类科学合法性的获得源于把自己视作真理及有益于人类进步的双重断言。

人文科学的启蒙观在其发展中并非没有遭致异议。保守派学者（例如伯纳德和伯克），浪漫派学者（例如赫尔德、黑格尔和华兹华斯）就反对将理智与情感、想象及信念区分开来。他们批评说，这种机械论的科学世界观是非人化的，并抗议暗含在科学文化中的把道德自由降到最低程度的做法。泛言之，许多保守派和浪漫派批评家对科学的否定是他们对现代化的全面否定的一部分。后现代批评家与上面那些对科学和现代性思之甚少、常常表现出反应迟钝和思想空虚的评论家完全不同，他们基本上没有这种遁世离俗的思想。他们既不想脱离世俗文化，也不必舍弃文化启蒙和人类科学带来的社会希望。不少后现代主义者希望保留文化启蒙的主要价值观，如自主性、个人主义、宽容、多元主义和民主。但他们坚持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知识和社会进行重构。

人文科学后现代转向的实例首先针对的是为人文科学提供“基础”的努力遭致失败的历史。越来越多的理论试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但即使是依据这些理论的自身标准去衡量，它们也都失效了。此外，启蒙传统的批评家是在社会控制和支配的动态变迁中来探究科学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无论是对于那些认为科学必定连带造成男性支配的女权主义者，还是对于那些埋头分析科学—医学话语的限制性和规范化功能的后结构主义者，“科学必定能推动人类进步”这个论断都在相

当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如果说科学与社会进步的联系正在受到质疑的话，那部分地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变化已使科学在社会制约的各种日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换句话说，人文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与后现代性社会条件的出现是相关的。因此，知识的后现代重构对于理解当代西方，对于保持人文研究与它的解放目标的联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门人文学科而言，无论它是解构性的，还是谱系学性质的，抑或在其中想象改变了知识和权利的关系以及知识的生产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关于它的种种理论假设无不企望在后现代的文化中保留下启蒙文化的批判精神。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着重阐述了关于知识的论争。他提出了后现代转向的一个主要议题：后现代文化的鲜明特征是：“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合法化权力正在衰亡。元叙事指的是对现代知识、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的合法化起主要作用的那些关于社会进步的基本理论（即关于知识、道德和审美的理论）和美妙故事。利奥塔坚持认为，诸如洛克、康德、胡塞尔和罗素传统中的知识的哲学理论以及孔多塞、马克思或帕森斯关于人类进步的故事都是元叙事，都已失去了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实践进行辩护的权利。

社会知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后现代的文化之中？利奥塔的论述中暗含了两种可能性。首先，人类科学可能成为官僚化的社会操纵工具。然而，在一个越来越被视为不稳定和不可预料的世界上，被强调的往往更可能是知识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利奥塔描述了后现代科学的兴起过程。这种后现代科学的知识抛弃了绝对的标准、普遍的范畴和宏阔之论；它们支持局部类型的、以历史为具体环境的和语用类型的社会调查。后现代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使我

们意识到并且去容忍各种社会差异、话语含混和冲突。

在这篇论述元叙事走向衰亡的论文中，利奥塔表述了后现代转向的一个主题：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元叙事预设了理解人类心智、知识、社会和历史的一个阿基米德式的（archimedian）即非历史的立场。利奥塔提出这样的见解，即元叙事合法性的沦丧部分地反映了这样一种非历史立场和普遍有效知识的可信性相当令人怀疑。由元叙事转向局部叙事，由普遍理论转向语用策略，所有的这些转变表明，我们想象的是反映不同社会地位和历史的多种多样的心智、主体和知识，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心智或一种理性的认知主体。在社会领域中非中心化的平行进程是显而易见的。利奥塔坚持认为，不论我们讲的是自我还是政治，都不存在着中心，即不存在秩序、连贯性和目的的统一基础。后现代的特点是在知识的领域摈弃了确定性和所谓的“神眼观点”（God's eye point of view），摈弃了支配社会及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一元化标准中央集权和组织严密的原则，以及不再那么迷信一个一元的和一致的自我。

对于福柯而言，关于非中心化世界的主题是极其重要的。例如，《事物的秩序》一书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人”（man）的概念不是人类科学的起源，而是人类科学的创造物。同样地，在《性史》一书中，福柯论证道：性主体并非性理的自然起源，但性知识（例如性学和精神病学）却有助于产生性主体。福柯并不用非历史的眼光以及真理和启蒙的语言来研究知识，他论及主导知识和从属知识，知识的多种主体和多种生产者，知识与“统治—反抗”之各个中间轴的内在联系。福柯敦促人们放弃启蒙运动那种对知识之基础以及知识体系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掩盖了知识与权力的纠缠不清的关系。他赞成的是“谱系学”而不是科学。这种谱系学分析就是追溯同一性、自我、社会准则

和制度的形成过程的历史-批判分析法，它集中于探究医学和人类科学在“约束性”(disciplinary)社会形成中的作用。

理查德·罗蒂从不那么明晰的政治观出发，也提出文化和社会非中心化这个相同的主题。他所关注的是哲学的现代传统。在他的《哲学与自然的镜子》一书中，他从现代哲学中体察到一种对建立知识基础的持久不变的追求。哲学承担起把科学合法化为知识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哲学假定了悟性的心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区别并把语言看作再现的中间介质，把知识表述为语词和客观世界之间的镜像。罗蒂对这个建立基础性工作计划的可信性提出异议。哲学上试图划分知识与幻觉、科学与非科学、真理与谬误，以及试图明确地表述真理、道德和美的普遍标准的努力，一直都难以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和形而上学的主张之中。尽管现代哲学在经常假设普遍心智和普遍真理，罗蒂却把他的论题指向创造了许多表达自我和客观世界的词汇的传统和社团。他突出了知识的语用特征。思想是为了做事，即为了推动某种利益和目标的实现。由此，罗蒂相信，人类科学中的诸多争议可归结为社会目标的不同。例如，为“解释”(explanation)辩护的实证主义者与那些把“理解”合法化为社会科学优先选择的逻辑的解释派社会分析家的争议，更多地是在知识的目标上而不是在知识的本质上。罗蒂并没有放弃知识的道德性。恰恰相反，他敦促人们在研究知识时要兼顾到知识的现实意义。他认为，作为文化批评家和故事叙述者的社会分析家的价值就在于其对于一个民主的公众领域所承担的义务。

利奥塔和福柯向社会知识的启蒙运动范式挑战的社会根源在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反叛。他们从当时的学生和劳动者的抗议热潮中，从要求改革监狱和精神病院管理制度的运动中，以及从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的运动中看到了对启蒙文化范式

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质疑。这些反叛性的运动使得理论和政治的关注点从过去只专注于劳工问题、阶级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拓展到关注有关人体、性态、性别、学科的动态性、规范化、行政管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60年代的社会冲突孕育了新的知识（例如，谱系学和局部叙事），复兴了一度遭鄙弃或抑制的民俗知识(folk knowledge)。

科尔内尔·韦斯特和唐娜·哈拉威描述了这场“后现代转向”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根源，反映出他们同样的政治观点。韦斯特简要地提出了一门广义谱系学的纲要，他称之为“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广义谱系学论述了被漠视的、被夺权的(disempowered)群体向霸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男性主宰的、异性恋主义的文化提出的挑战。韦斯特追溯了在战后的西方，一个由欧洲人和英裔美国人组成的社会精英群体不断丧失其权威性的过程。这个社会精英群体力图为他们的那种特定的、民族优越论的文化和政治赢得普遍性。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休戚相关的各种社会反叛运动，有新左派的，有女权主义的，有男性同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的，还有少数民族的，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都批判了启蒙文化运动以理性和社会进步为幌子来维持不平等和压迫的长期存在。“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并不错误地去追求普遍性和真理。相反地，它张扬个体、差异、异质、局部性和多元主义的价值。韦斯特就主张用“先知的批判”(prophetic criticism)——一种以公众为中心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批判思维，来取代西方科学主义的传统。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威亲身体验了启蒙运动——尽管它包涵了解放的意识形态——如何以种种方式对妇女进行压迫。科学把男人作为全人类的典范来突出。这就无视了历史上与男人生活有种种重要差异的妇女生活。西方科学促

使女性在文化上默默无闻，在社会上沦为附庸。在西方科学的传统中，女性独特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均受到贬损或忽视。女权主义者建议社会分析家们关注在认知和存在方面男女所表现出的不同方式，以此来改变人类仅有一种普遍语言的状况。女权主义者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即主张男性和女性所代表的是对立统一的性别体验和同一性。哈拉威为自我和社会的性别文本的一般主张辩护，但她批判了普遍性别划分的主张。女人和男人因其阶级、种族、年龄、性态或国籍方面的差别而具有了不同的经历、利益和价值观。主张妇女统一性的结构中已内涵了对某些女性的排斥和压制。哈拉威主张一个无中心的自我的观点：同一性将被看作是零碎的、多元的和变化不定的事物。有关妇女同一性的断言只有在它作为一种修辞学和政治学的策略时才有可能是合理的。哈拉威将社会主体和知识的非中心化与战后时期新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反叛相联系。她还将这些社会反叛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诸如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产生、工作和家庭的重建以及性别、性态和种族的组合等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相联系。

启蒙文化正在丧失其为生活在西方的芸芸众生的生活提供合法性、连贯性和目的性的能力。它的确定性和社会目标正在受到挑战，并且正在丧失其宝贵的文化资本。

当人类迈向两千年之末的时候，我们这些西方人正在迈步行进后现代的文化领域。在这种文化中，知识成为多样化的知识；同一性将被视为零碎的、多元的和渗透性的；社会和政治也是没有固定中心的。社会知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知识的学科构建会以什么方式进行呢？这个导言的后三节将审视作为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重要论述。